

张
武著

新聞天地

中国文联

5

新闻天地

张 武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新 闻 天 地

张 武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银川市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12.125印张 2插页 270千字

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宁夏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250册

ISBN7-5059-0623-2/I·404定价：3.4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具有地域个性和精气神韵的中篇小说集,共收七个中篇。随着女记者在《新闻天地》中的阅历,我们可以看到高级干部的工作生活和官场纷争的秘闻。《楼外楼》的芸芸众生则给人们展示了改革的画面和为之奋斗的艰辛。《九九归一》《草原旧梦》等篇以冷峻的目光审视历史,笔触凝重,发人深思。

《能人协会纪事》用轻松调侃之笔揭示当今社会流行的虚妄弊端,语言幽默,令人捧腹。《小土屋》中那些普通人所代表的我们民族性格中的自尊心、自信心和不屈不挠、奋发进取的时代情绪,令人灼灼可感。在书中我们既可以领略到西部地域莽苍、粗犷的自然景色,也可以感受到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为四化建设献身的精神风貌。作品真挚、朴实,风格清新,情趣盎然。

目 录

新闻天地.....	1
能人协会 纪 事.....	44
小 土 屋.....	94
草原旧梦.....	154
徐家的儿女.....	241
楼里楼外.....	275
九九归一.....	332

新闻天地

首先，我得向读者诸君自报家门，通名亮姓，免得大家没头没脑，劳神费心。当然，有的同志会嫌我罗嗦：又是这一套！

须知，这一套也不容易！

现在我们的中国，有一种理论，认为文艺作品，须彻底扬弃中国古老之旧传统，全力引进西洋之新手法，象领导阶层追求外国小汽车那样，奔驰于四化改革之道。否则，绝无出路。那种拘泥于有头有尾，有名有姓的路子，简直应该寿终正寝，躺进棺材，从此休矣！当今之文坛，已非昔日可比。欲吸引读者，须先意识流起来，外加荒诞，再加魔幻，再加空灵，再加……总而言之，要千奇百怪，天马行空，虚无飘渺，空中带洞，灵而有鬼，是是非非，朦朦胧胧……嘿，我自己也犯上了。话往回说，我乃某省报记者——何不披露地名？这也和新手法中以A、B、C代替地名、人名一个道理，避实就虚者也。但也用不着怀疑敝人之身份。我的记者证是报社发的，编号00111，上面有本人的照片，有发证机关的钢印，有名有姓，样样齐全，并非什么新闻研究会之类的函授大学巧立名目，高价出售的不值钱玩艺儿。现在的社会上，以假乱真，以次顶好，冒牌货比正牌吃香的事情，俯拾即是。我们记者行列也大有人在。不过我乃堂堂省

报的正式记者，又是名牌大学新闻系毕业，丝毫没有含糊。

前不久，我们省委的吴书记亲自带领干部到农村调查研究，报社派我随团采访。那真是一种光荣而艰巨的任务，紧张而有趣的工作。起初，一切都很满意。回来，写了一篇连载通讯，编了一个电视剧，还计划写一篇报告文学。因此受到了领导的一次表扬。正当我为这不虞之誉沾沾自喜的时候，风云突变，毁言迭起…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且听我从头说起。

一

我这篇轰动一时的杰作《改革者的足迹》在省报发表的当天，好象有什么预感似地，我的情绪特别地兴奋，天气也格外地明媚。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块，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精神状态，人人都有过得意的经历，不用我说也会明白的。当时我穿了一件新买的白底洒花连衣裙，用异常轻快的步子走进办公室。同志们平常就喜欢和我开玩笑，这天见我招展而入，齐声欢呼：

“小郑驾到！”

“嘿，咱们的美人儿今天打扮得多俏！简直光彩照人！”

“是呀，人逢喜事精神爽嘛！”

……

这是什么话！

我们的办公室，两间房子，五张桌子，四名工作人员，是个“大集体”。四人之中，男士一人，女同胞三名。那位男士平日深居简出，很少抛头露面。原因是他有一颗与众不同的“政治心脏”。一年里头，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，“心脏不好”，在家静养。有时也出来干点别的社会工作，究竟做什么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很有几分“内参”记者的派

头，他善于和一些特殊阶层的特殊人物打交道。也多亏有他这么一位人物，我们几个女同胞近水楼台，能够比别人早知道一些“十分可靠”的政界新闻。上级机关的内幕小道消息，诸如人事变动，意见纷争，以至政界要人或社会名流的隐私秘闻，也常常由他的嘴津津乐道而出，调剂我们的生活，焕发他的精神。凭良心说，他的内幕消息通常是很精采的。因为得到的消息精采，自然鼓舞人心，他的心脏也就正常起来，专程到机关传播一次，逢人便讲，乐此不倦。

这天他先我而到办公室，一定又得到什么重大新闻。可惜我进去的时候，他已经广播结束，只是伙同其他几位女同志和我开了一通玩笑，就急忙转到别的办公室去了。

由于这个原因，我们几个女士，责无旁贷地就成了记者部的骨干力量，而我，简直可以说是中坚。这倒不是说我有什么了不起的工作能力，只不过是年龄上占优势。那二位分别是“拖拖拉拉”、“婆婆妈妈”，行将和青春告别的年龄，哪比得我“风华正茂”！因此，她们除了让我多干点跑跑颠颠的杂务外，还喜欢拿我这个漂亮的小妹妹开些善意的玩笑，活跃气氛。我也不以为意，反而感到亲热。可今天她们这种口气，好久不露面的男士也兴高采烈地来机关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还未等我明白过来，电话“嘟嘟”地响起来。资格最老、身体最胖、牢骚最多的任明莉就近拿起了话筒，很不耐烦地“啊”了一下，又“嗯”了一声，看了我一眼，把电话放下，带着异样的笑容对我说：“主任召见！”

她说的主任，就是我们记者部去年新提的副主任柳德明同志。在某种程度上讲，他是个暗无光彩的人。据说，他和任明莉同时进的报社，同时在地区记者站锻炼。两人资格一样老，能力不分上下，但生活就这般奇妙，很不起眼的柳德

明，却比锋芒毕露的任明莉幸运得多。早一年回记者部，提拔任用也抢先了一步。虽然提拔干部的因素很复杂，远不是普通老百姓所能了解清楚的，但柳、任二位，究竟是难分高下的同茬干部，一个当了官，一个仍然做普通工作，任大姐如何不气！她那酸溜溜的牢骚话，有一半是冲着柳主任发的。当然，这也不单是任明莉。据我所知，自从机构改革、调整各级领导班子以来，到处都出现这类人物。那些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年轻干部，个个都有这种困扰和苦恼。在一个单位，条件差不多，或者条件差而资格老，或者因为其它而未能提升的人，便采用任大姐的这种手法，暗中支砖头，使绊子，明着说风凉话，叫你心情不舒服，工作担子压不垮，也得气个半死。末了，还说你能力不行。即使你气不死，也有口难辩，解释不清啊！

不过据我冷眼观看，柳德明当主任，除了时运之外，实际能力也要比任明莉强一些。柳德明毕业于北大新闻系，今年刚四十，但锻炼得持重稳健，相当成熟。他不但思想敏锐，而且很有政治头脑。既有新闻记者的天赋，又有文学艺术的修养素质。难得的是他领会精神快，笔头利索，写一篇千字短文，两个小时即可得手，有倚马可待之功。至于通讯报道，那更是轻而易举、随随便便的事。而且文法严谨，不拖不赘。就这一点，当个小小的记者部主任，还有什么可非议的呢？但是任大姐看不起他，就连接他的电话也不情愿，带着轻蔑的口气，“啊”，“嗯”，不多说一个字。

我得到“主任召见”的指示后，就赶忙向斜对门的房间走去。

柳主任的办公室没有带锁，门半开半掩。据他自己说，这是和女人打交道的经验做法——光明正大，免得别人钻空

子说闲话。他一个人坐在办公桌的后面，象当年的“天天读”那样，精神专注地盯着桌子上的报纸。见我进去，抬了抬屁股，点了点头，他那刮得干干净净，忧郁寡欢的脸上，带出很有分寸的笑容，用一贯和缓的语调传达一个使我高兴的特大喜讯：

“亚秋同志，上面来电话说，领导上表扬我们啦！”

同时用手中的铅笔头点着他面前的报纸，头版头条是《改革者的足迹》。作者的名字，也就是我的名字，郑亚秋，不是用括弧括在文章的末尾，而是紧挨着标题的中间，三号楷体，十分醒目。难怪柳主任的口气比平日亲切。过去他在我面前总是以领导者的身份，用长者的口气，随随便便地叫我“小郑”，或者郑重其事地叫“郑亚秋同志”，从来没有今天这样亲切过：“亚秋同志”！

千万不要小看主任省略掉一个字。正如他平日修改稿子一样，是经过反复推敲，深思熟虑的。显而易见，这是与“上面”来的电话有关系。而且，领导表扬的是“我们”，说明应该享有表扬荣誉的，并非我郑亚秋一人，其中还有他柳主任本人，或者还有别的同志，甚至包括患“政治心脏病”的那位男同志和对他有意见的任大姐等人，也未可知。其实我心里明白，这篇通讯，虽然署名郑亚秋，而主要功劳却在柳德明。除了采访本上的素材之外，其它工序，诸如谋篇布局，结构分章，选词用句，修改润色，直至文章标题，无不渗透着柳主任的汗水和心血。署我一人的名字，实在于心有愧！当初我也曾提出，把主任的名字搁在前头，他坚决不答应：“那不妥，那不妥——我只不过是出出主意而已，怎能掠人之美！”

柳主任的话，也不完全是谦词。作为一个部门的头头，

他确确实实是按照斯大林的名言履行自己的职责：出主意，用干部。他从来不越俎代庖，干那些不值得他亲自动手的琐碎事情。他只给我们出主意，点到为止，不仅在本部，甚至在整个报社，他也以“点子多”而闻名，同时又以“反应快”受人称道。大至某一时期的宣传重点，版面规划，小至一条新闻的采写角度，他都能给总编辑拿出高明的“点子”。当初推荐我跟随书记的调查团采访，就是他的主意。后来写通讯，又是他出谋划策，悉心指导。但他又是这般地谦虚，不图名不图利，甘当无名英雄，我只好心里明白，铭刻肺腑。适当的时候，我要专为他写一篇文章，好好颂扬颂扬。可现在不行。眼下要全力修改完成《改革者的足迹》。主任如此重视，我能不尽心尽力吗？

二

柳主任指派我下乡随团采访的那天，也是一个明快、清新、阳光和煦的早晨。他照例用电话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。

“给你一个任务，”他用手里的铅笔点了点我。“这个任务，我和领导上商量过了，可以说，是一件艰巨而光荣的任务……”

“究竟是什么事情啊？”我憋不住，问了一句。

“看，你又犯急性病啦！”

他温和地批评了我一句，接着说：

“是这么回事——刚才，高副总编找我，说，他接到省委办公厅秘书长的电话，传达省委吴书记的指示，说他要下乡现场办公，搞调查研究，让新闻单位也派记者同志……”

“去几个人？”我总是憋不住。

“报社就你一个人。书记有指示，不搞兴师动众。”只派

一般的记者，报道报道农村的大好形势，改革当中的先进事物，但不能过分张扬，更不能突出个人——这一点你可要记牢，不但是书记的指示，也是咱们搞新闻工作的准则！”

“我能行吗？”说实在的话，当此重任，我有点胆怯。

“能行！”主任肯定地说，“咱们这里，过来过去就这么几片子人，有的有拖累（在任明莉面前他是不敢这么说的），有的身体不好，考虑来考虑去，你最合适。”

其实，这是违心的话。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任明莉。她在记者站驻了多年，熟悉农村的情况，又有丰富的采访经验。但主任不敢派她。有一次，派她去采访一个十分重要的表彰大会，因为大会工作人员忘了给她发纪念品和戏票，她居然没有报道那个消息。领导上追问的时候，她一口咬定没有接到通知。因为她有这一手，一般小单位的活动，都是车接车送，纪念品加倍，求她高抬贵手，多多宣扬。随书记下乡，虽说光荣，也是苦差，主任怕她不接受，同时也担心她误事，因此不敢劳驾，一个劲儿地给我做工作。

“你去吧，这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，是个光荣而艰苦的任务……”

我们这位主任，改起稿子来，大刀阔斧，如斩乱麻；写的文章也干净利落。但不知怎么搞的，讲话竟是这般拖泥带水！任明莉看不起柳主任的地方很多，说话不利索，是主要罪状。她的嘴本来有点扁，每当主任训话，她就扁上加扁，以示轻蔑。背地里还要损几句：“说话就这德性，像母猪下崽，半天一个，半天一个，还当领导！”

我不敢看不起主任，但耐心总是有限。听他反来复去强调任务的光荣艰巨，便截住问了一句：

“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看把你急的！”他笑着提醒我一句。“你做些必要的准备。比如有关当前农村政策方面的文件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……到时候有用处。”

我点点头，感谢他的关怀。

“还有，报道也要体现改革精神。这次同去的还有电台、电视台的记者，咱们可不能落于人后，消息要及时。报道手法，要从咱们报纸的特点出发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别开生面的报道方式，树立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崭新风格。那种陈旧乏味，多少带点浮夸的报道，甚至带有文学色彩的描写手法，从今以后应该统统抛弃掉！”

我快速记录了主任的这些指示。

主任接着又对采访事项作了进一步的指示：

“注意！你是新闻记者。一定要用纯客观的眼光观察事物，看到它的本质。要学一个高明的摄影师，客观地把镜头对准群众场面，多摇少停。不要象电视台的记者那样，死板地盯着领导，又拉又推，放大特写，那不是我们的作风！”

他的话使我大感兴趣。

我一面飞快地记录，一面点头赞许。不愧是主任，有水平。说出了人人心里想，个个口中无的精辟高论。虽然我自己是新闻记者，但我对新闻报道，包括电视新闻中突出领导，接连不断的特写镜头，感到十分不舒服。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，都是一些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，哪能象美国的里根总统，演员出身，善于表演！可是电视记者的摄象机偏偏喜欢近距离地对准他们，简直是打着鸭子上架，强人所难，逼领导同志，不会演戏也得演戏，故作姿态。这样做的结果，非但没有突出优点，反而暴露了某些缺欠，甚至出现假面孔。八十年代的中国群众，什么话说不出来！无端地留

下笑柄，叫人指手划脚。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，写“本报（台）消息”的人的责任吗？多么可怕的风气！如此看来，柳主任的指示，不仅是经验之谈，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柳主任作完这一段指示，目光中又出现了忧郁神情。他大概又开始考虑另外的“点子”了。我站起身来问：

“怎么个走法？”

“嘿，我差点忘了！省委早有规定，领导外出要轻车简从。秘书长在电话上说了，车辆统一考虑——你可以直接和王秘书联系。”

那次召见，受益非浅，大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。在跟随书记下乡采访和编写通讯报道的过程中，我都认真执行了主任当初的训导。如今《改革者的足迹》之一已经见报，上面也有了表扬，他还有什么话说呢？

三

柳主任极力控制着脸上的得意之色，简略地、近乎轻描淡写地传达过上面的电话表扬，把当日的报纸随随便便放到一边，又拿出《改革者的足迹》之二的清样，边读边推敲，和我共同“过细”一遍。

这一部分的副标题是“新作风，高效率”，主要写省委吴国贤同志步行视察水利建设工地的事迹。原先我的稿子中单纯写吴书记在工地现场办公的事，柳主任看了电视新闻以后，又翻看了我的采访本，经过挖掘，加重了步行上山的情节。

电视记者拍摄这部分镜头我是知道的。而且我也沾光，在屏幕上闪了几下，其中一次，还在书记身边，露了露脸。但我以为，电视新闻和报纸的文字报道毕竟不是一码事。电

视靠它特有的表现工具，可以把毫无意义的动作真实地再现出来，却又是一晃而过，不象我们搞报纸的，白纸黑字印出来常存永留，让人们细细品味，反复琢磨，任意评论。

现在要报道的是省委书记，怎么能不慎之又慎？如果不认真考虑，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有闻必录，不做取舍，那会成什么样子！对于书记步行一事，我就有这种观点，既没有在消息中单独报道，也未在通讯中详细描绘，只是提了一句。因为事情的起因和调查研究并无内在联系，至少不是有意识地计划安排，只不过是偶然为之罢了。

正如我们柳主任传达的那样，那次吴书记下乡搞调查，为了切实改进领导作风，他定下了轻车简从的原则，尽可能地少带人马，少出车辆。调查团成员，包括我们几个新闻记者，不过十二个人。本来电视台记者有资格自备汽车，但书记不同意。“不要兴师动众！挤在我们的车上算了！”因此，电台的陈记者，电视台的老袁，连同他的摄影机、灯光、录象带，均由调查团统一安排。

但是事情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当吴书记在县委听完汇报，要去山区视察水利工地的时候，我们坐去的两部进口越野车辆都出了毛病，需要修理，让县委出车，办事人员献殷勤不拣时候，竟然派了两部崭新的“皇冠”来代步。吴书记当时就沉下脸来问为什么派这种车，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口结舌，无言以对，拿眼睛直看县委书记。县委彭书记是个机灵透了的人，他灵机一动说：“吴书记，咱们步行上山去吧。不坐这个车了。我就不信不坐这个车我们还不革命了哩！”

调查团副团长，省经委主任田广出来解围。这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中年汉子，身体矫健，动作灵敏，讲话风趣。他首

先响应彭书记的提议：“好！我们步行拉练。观花看水，自由自在，妙极了！”

一边说，一边原地跳了两个蹦子，胖而磁实的矮个子，就像电动的石杵那样，杵得地皮颤抖。

看着他的怪样子，在场的好几个人都笑了起来。僵冷的空气也随之活跃。吴书记也就随意地说：“那就走吧。走走也好。”

那次步行上山的决定就是这样做出来的，谁能说它有多大的战略意义？

四

电视台记者倒捞到了报道机会。

如果说那次跟随书记步行视察水利工地，有什么事情留下了难忘印象的话，那首先是电视台老袁奋不顾身，抢拍镜头的忘我工作精神。这个袁记者，表面上不吭不哈，蔫蔫呼呼，但心里很有主意。业务相当熟练，动作又灵巧，谁也没有想到，在书记作出步行决定之前，他就做好了轻装上阵的一切准备。该留的留，该带的带，妥妥帖帖，不愧是新闻战线上的老战士，经验丰富。一路之上，他紧紧盯着吴书记，寸步不离。当然，他更多的时候是跑在大部队的前面，再回过头来，用他的新式武器对着我们，重点是吴书记的面孔，瞄来扫去，沙沙作响，书记躲之惟恐不及。

吴国贤同志和我们通常想象的那种领导干部差不多，衣着普普通通，但神采奕奕，待人和蔼可亲，至诚坦率。对我这个“女娃娃”特别关照。他虽然是年过六旬的老人，精神却很饱满。

当时正是五月天气，田野里绿水融融，麦苗青青，鸟语

花香，真可谓景色宜人。吴书记的兴致越走越高，说是让县委的老彭带路，实际上是吴书记自己打头阵。五十年代，吴国贤同志在这个县当过县委书记。他不仅熟悉路途，而且对沿途的村庄、水利设施也记得清楚，不时地给我们指点，说当时是什么什么样子，现在如何如何，不断地发着感慨，其中也夹杂着一些对工作方面的指示，县委彭书记和我们记者一样，拿着笔记本随时记录。电视台老袁看我们动手，很有点吃亏的样子。直到到跃进渠分水闸休息的时候，他抓住书记和管水员谈话的机会，结结实实地拍了一阵。

过了平川就开始爬坡，道路也艰难起来。有的地方砂砾遍地，卵石绊人，有的地方虚土盈尺，走不多远，人人风尘仆仆，满身是灰。我常常不得不停下来，坐在地埂上脱下鞋子，倒出里面的石子。但吴书记和田主任他们不存在这种问题。在我的感觉中，他们脚下的速度越来越快，特别是吴书记，常常撇开正式的公路，绕到两边的水渠和树林里去观看，我不得不格外地加劲用力。电台的陈记者，是个瘦麻麻，看起来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，但在行军途中，士气一直很旺盛。他的采访本和钢笔从来没有收起来过，紧紧跟在书记后面，边走边记，有闻必录。老袁自不必说，他走的路恐怕要比我们多出好几倍。他也穿着一双高腰的翻毛皮鞋，但从来没有抖过石子。他也大汗淋漓，但很少腾出手来揩脸上的汗水。尽管书记极力避免他的镜头，叫他不要浪费胶片，但老袁还是忠实地执行他的任务，不放过书记的任何一个行动，同时也拍了许多风景画面。特别是到水利工地以后，为了抢拍书记现场办公的场面，他爬高钻低，几次登上水泥制品的材料堆，被钢筋头刺破了腿肚子，挂彩流血，他还是满不在乎。只是掏出自己的手绢，让我给他草草包扎了一下。